# 朝鲜朝"士大夫"的参与政治形态与影响

### 方浩范

### (山东大学东亚学院 教授)

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半岛,根据统治阶级政治的需要,"士"从一个读书人、"士林"从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上升为"士大夫"官僚阶层。从此以"儒者"为核心的士大夫,影响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文化。儒学对朝鲜朝的诸多影响中,始终离不开"士林"和"士大夫",离开它几乎无法能够完整地了解朝鲜朝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对朝鲜朝的影响。因为主导丽末鲜初"易姓革命"的过程中,"士林"人士和"士林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丽末开始的"士大夫"所接受的主要的是宋代思想,而宋代士大夫不但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建构,更渴望在实践层面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们把"以天下为己任"看做是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陶铸和砥砺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宋代时期的这种士大夫思想,不仅影响了丽末开始登场的士大夫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朝鲜朝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当然,在"士大夫"参政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并不盲从于统治者,而是坚守了自己独有的"士大夫精神"。朝鲜朝时期的"士大夫"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

#### 一. 政治构造: "君臣共治"

"君"与"臣"关系是一个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体。君臣观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

<sup>&</sup>lt;sup>1</sup> 王泽应,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 道德与文明, 2015(4), P51页。

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君臣关系处理情况的如何将会关系到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 如果君臣关系处理得当, 那将是一片和谐止境, 但君臣关系处理不好, 则将会带来巨 大的分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君臣观问题一直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甚至 普通民众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在准国家的唐虞之世抑或夏商 周三代之时,君不可独治、君主臣辅的观念就深入人心了。他们将君臣关系比作元首 和股肱、船夫和舟楫、飞鸟和羽翼、大厦和栋梁等等,其寓意就是强调君臣的一体关 系。而其对立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君臣之间的上下、贵贱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君臣关 系并不是永远和谐的"。<sup>2</sup> 君臣关系存在一致性又存在矛盾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孔 子认为君臣之间不应该是单方面的臣子侍奉君主,臣子对君主是要忠心,但是君主对 待臣子也有礼,这样才能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毕生致力于依托圣君贤臣实现 其心目中的"王道"理想,认为"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 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上》)显然,先秦儒家把治国、平 天下的理想寄托于有内圣之德的君与臣,具有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倾向。 3 有 了这样的君臣关系,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必然要提出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考察中 国政治制度,在很在程度上处于"君臣共治"状态。所谓"君臣共治体制",即"士 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在中国古代中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君臣共治"。实事求是地说, 先秦儒家谈论政治,始终都把君臣伦理视为一种天经地义、近乎自然法则的客观实体。 在"君臣共治"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长期居于核心地位。钱穆先生 在他的《国史新论》中纵论汉唐宰相制度的差异时说: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 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需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 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画一款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 因此,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成为了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

围绕着"君权"和"臣权",以郑梦周主首的稳健和郑道传为首的改革派的想法却不同。郑梦周想继续维持高丽王朝为前提逐渐改革高丽社会,认为这是臣子应尽的道理。但是,以郑道传为首的激进势力认为,如果想用儒教式王道政治,必须要推翻高丽王朝。郑梦周和郑道传政治观的差别来自于对"王权"的认识。郑道传认为"王

-

<sup>&</sup>lt;sup>2</sup> 陈味象,论先秦时期君臣观,群文天地,2011 (11) ,P83-84 页。

<sup>3</sup> 参考,吴敬华的"先秦儒家君臣观念探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1 年 5 月。

权"来自于"臣权",郑梦周则认为"臣权"来自于对君王的"忠"。纵贯朝鲜朝政 治历史的发展进程,由于政治体制是儒教式国家主义,因此在王权与臣权的矛盾和冲 突的过程中,朝鲜朝政治思想是实事上的以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混和体"。也就是 说, 当以君主政治体时候, 存在着贵族为中心的政治内容; 当出现贵族政体的时候, 还维持着君主政体的外形。在这样的政体下,士大夫的作用是连接君主与百姓中起到 媒介的作用,使他们相互间达成某种一致性。尤其在朝鲜朝世宗时期,王权与臣权有 效结合,使得朝廷政治得到安宁,民生得到平安,民族文化得到有效发达。朝鲜朝 "王道政治"是以儒教来"武装"的国王与大臣,能够实施儒教政治的体制,并以儒 教的民本思想为基础,实施德治和人情。正因为如此,在朝鲜朝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 曾出现过"暴君",也出现过"奸臣"、"宦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了 "君臣共治"。在朝鲜王朝中期(守成期),针对勋旧派政治势力,士林政治开始登 上了朝鲜的历史舞台。这个时期是朝鲜历史上最为理想的儒学政治思想,士大夫们 (臣子)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加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由于朝鲜朝大臣们大部分出 身于"士林",这些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对性理学有很深的了解。国王们为了 在"共治"国家的过程中,不至于落后于大臣们的思路,每天参加大臣们的"讲议" 和"学习"。

在朝鲜朝"君臣共治"的官僚体系中,"臣"的代表往往就是"宰相",而且宰相在韩国历史发展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巨大的。围绕着君臣关系,郑道传认为,国王虽然是受天命的统治者,然而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象征性"元首"。国王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要选好有德有才的"宰相",由他来治理国家。宰相处理重大事情的时候固然要与国家商量,然而宰相应该是政策决策者,又是政策执行者。郑道传又认为,国王的"王道政治"并不见亲自执政,而是能过录用和选拔优秀的宰相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宰相之职应该是上则调和阴阳,下则抚安黎庶,内以平章百姓,外以镇抚四夷,国家之爵赏刑罚所由关也。"天下之政化教令所由出也,殿陛之下,论道德而佐一人,庙堂之上,执陶甄而宰万物,其任岂轻哉,国家之治乱,天下之安危,常必由之,故不可易其人也。"(三峰集,卷 5,经漳文鉴,宰相之职)。他主张宰相要管理国政,宰相是君主的代理人,因此对宰相才质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同样,赵光祖也提出了把中央政治权利的中也轴应该是"圣君"和"贤相",即君臣共治的双重构造,作为为百姓的理想政治构造。他认为,"君者如天,而臣者四时也。天而自行而无四

时之运,则万物不遂,君而无大臣之辅,则万化不兴焉。""故古之圣君贤相,必诚意教孚,两尽其道而可共诚正大光明之业矣。(《静庵集》卷 2,,赵光祖所说的君主与宰相是具有上下关系的,即上命下服的关系。但是,为了光明正大的治理国家,圣君与贤相两个主体的共治是必要的。尤其是强调君主不可独断,宰相不可以自任。君主与宰相相互信赖为基础,建构担当政事的主体是君主与宰相的政治构造。

## 二. 政治模式: "公论政治"

"公论政治"也是朝鲜朝士林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士大夫实施自己政治纲领的 重要形式,更是朝鲜朝时期非常重要的政治模式。宋代的"公论"政治,尤其是朱熹 的"公论政治"对朝鲜朝"公论政治"的影响比较深刻。根据目前的研究资料而言, 没有在先秦儒学体制下的"公论政治"的研究,但我认为这并不说明"公论政治"在 先秦儒学思想中没有。"公论"最早出现在宋代,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 "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 公论。'""公论政治"是以君主、宰相与台谏相维相制的政治体制。公论政治表现 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应用于选人、用人。君主的权责尤重于宰辅与台谏之任免, 在关键人事更迭中有着更为积极的政治作用,但是君主却不能单凭自己的喜好或者私 心以一己之意而颁布任命。对执政官等相关重要人事的任命,往往需要考虑现任宰相 以及将卸任执政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再进行定夺,以免任人唯亲,导致官僚 体系的恶化:对台谏官的任免亦尤其需要在参考士林公论的基础上而行使。而这些任 命又必须要在程序上经过中书行下方才合乎体制。正是因为君主的任免要受到公论动 向等相关因素的极大影响,所以宋代政治实践中一个特异的现象就是,"士林公论常 常能够成为宰相执政进退的关键因素,由于舆论弹击而导致相位不保的例子,在当时 屡有出现"。4"公论"观念在朱子的经世思想中呈现为一种极富张力的形态特征,它 一方面意蕴为君主政制下的审议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也是理学公共天下、构思秩序的

<sup>4</sup> 黎靖德编, 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 第83卷, 第2170页。

#### 重要内涵。

深受朱子学影响的朝鲜朝,士大夫们主张"公论政治"的毫无怀疑的事实。"公论政治"的开端是成均馆主导的儒生社会的"公论",由于儒生们对不同时期带有"时势浮沉性",表明对政治局势和势力的敏感性。比如,当赵光祖主导推进改革政治的时候,这些儒生大部分站在改革一派;但己卯士祸后士林派被贬之时,这些儒生站在反改革的勋旧派一面,把政局回到过去。这似乎给人的感觉是儒生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突变的印象,但是这个现象是由于儒生中本来就有"进步"和"保守","改革"与"守旧"两个派别。所以当改革势力占主导地位时,进步势力主导"公论",而保守势力的"公论"无法显现;相反当处于士祸期时,保守势力的公论占主导而进步势力的公论被压制。

在朝鲜朝政治发展史上"公论政治"并非是独立的,它是相伴着"士林政治"、 "朋党政治"一起出现的。尤其在十六世纪后期,朝鲜王朝处在急剧变化的过程中, 围绕着改革方向的不同意见,形成了朋党政治并带来朝鲜政治体制的变化。此时,在 野士林们以乡村为背景,通过上疏参与政治,逐渐成为能过"公论"来代替依靠官僚 来行政的惯例。而且经历了壬辰倭乱时期,士林派利用义兵活动,克服国难的过程中, 进一步确保了自己的地位,从宣祖开始无论是在朝庭,还是在野士林的政治集团,以 朋党政治为前提,对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公论"对诀。在这个(公论)过程中,成 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他对栗谷的学问持有一此不同的态度, 但为了西人的 政治命运共同体,在公论政治方面与栗谷保持一。栗谷也非常强调公论的重性,他说 "窃念公论者,有国之元气也。公论在于朝廷,则其国治。公论在于闾巷,则其国乱。 若上下俱无公论,则其国亡。何则,在上者不能主公论,而恶公论之在下者也。防之 口而治其罪,则其国未有亡者也。"(《栗谷全书》卷 7)旨在朝庭上大胆地实行 "公论政治"。栗谷把士林视为公论的主体,按照他的观点, "如果士林在朝廷的话, 公论施与事业, 国家就会得到治理; 如果士林不在朝廷的话, 公论附以空言, 国家就 会变得混乱。"与朝鲜王朝为了实现这种公论政治的理想,对通过公论决定重要的国家 政策这一规定加以制度化。公论政治的结构大体上分为,"以国王为中心的诸如周期

5 李珥:《栗谷全书》(卷三),汉城: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1 年。

性御前会议(常参、次对、经筵)、司谏院、司宪府、弘文馆言论审查等在朝层次的言论就是其中之一;以馆学(成均馆、四学)、乡校儒生的上书、卷堂(罢课)等包括提出个人乃至集体意见的在野层次的言论;以在朝言论与在野言论进行宣传和强化,朋党在主导朝鲜公论政治方面的作用"。"如此而言,朝鲜朝公论政治的核心机关是司谏院和司宪府,即台谏。公论政治的形式中,"台谏制度"是最有效、最常用的方法。"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朝鲜王朝规定主要的国政以及有关人事的议案须通过各种会议和谏官审查程度才能决定。这是因为台谏不仅掌握着可以介入百官人事权的权限(署经),还被视为"谏官与宰相一起组织和处理天下大事"。可以说台谏制度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以台谏为首的许多"士大夫们"都具有自己身负重任、勇敢向前的信念,虽然有时候他们与人主争论是非,然而那也是肯定站在人主的左右,"谏诤"成为了公论的根基。

# 三. 政治形态: "朋党政治"

"朋党"是指为了所属集团或派别的利益,想尽办法争夺权利和排斥异己,互相 勾结而成"团体"。而朋党政治则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的产物,也是封建专制主 义的派生物。朋党政治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壤之中。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 发展进程中,朋党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并伴随和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从未消亡。封 建政治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朋党政治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朋党政治斗 争中,士大夫结党并与其中,甚至成为了朋党之争主角。随着儒学思想的传播,朋党 理论和朋党思想,以及中国的朋党政治必然影响了朝鲜朝历史文化的发展。不仅如此, 朝鲜朝的朋党政治之影响甚至超过了中国,在一个朝代里长时间里保持朋党政治状况

<sup>&</sup>lt;sup>6</sup> 朴贤模, 守成的政治学:朝鲜王朝公论政治的理念和结构, 当代韩国, 2004 (6), P56 页。

<sup>&</sup>lt;sup>7</sup> 王培友,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求是学刊, 2012 (1), P133 页。

连中国都不及。甚至于当代韩国的政治文化中,还带有浓厚的"朋党色彩"。

朝鲜王朝延续了五百年,期间就有两百多年被朝廷中的朋党势力所掌控,各方势 力你争我斗,互相竞争,而这种以朋党为中心持续数百年的的政治现象在古代世界历 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根据前面的介绍,朝鲜朝政治是以"士族""士林"为基础的政 治,由于士族所具有的集团化的倾向,他们很容易结成"朋党"。但是,朝鲜建国初 的太宗和世宗,还有世祖是强势的君主此时的政治是君主主义压倒一切。因此,朝鲜 朝初期的政治和朋党政治是有一定距离很远,王朝的初期的政治是由开国功勋和君主 来主导。为了防止"朋党"集团的出现,朝鲜初期从刑律上规定禁止朋党。他们沿袭 了中国明朝所谓的"大明律",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 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这此严禁朋党的条款,在在抑制朋党政治的过程中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朝鲜朝初期是以"君主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政体要求朝鲜朝臣 民要忠诚于君主。由于政治向君主主义倾倒,对于禁止朋党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 而,随着朝鲜朝社会各种环境的变化和国王的交替,国王所掌握的强权要依赖于君主 的资质,君主主义因此也不稳定。随着年青年成宗的即位,君主政权开始受到冲击, 王权不得不面临分权的局面。但是由于"朋党政治"还尚未成型,得到分权而担当管 理国家的集团并中"士林",而是勋戚贵族主义。由于勋戚和国王(君主)存在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政权是要依靠于王权,在王权的庇护下行使管理权,因此在勋 戚贵族主义政治中, 朋党同样是被禁止的。从成宗中期开始, 士林派势力在政治上有 所征兆,但士林的"朋党政治"还远远没有展开。此时的朝鲜朝政治是君主、勋戚贵 族势力和新型士林阶层之间的冲突,从而发生了朝鲜朝的"士祸"。士祸虽然对士林 派势力进行了镇压,但是经过了士祸之后,士林派开始成长为政治的主导势力。

朝鲜的朋党政治,严格地来说,是从宣祖大王统治时期(公元十六世纪后期,明朝万历前期)的东人党和西人党分裂开始的。但是,朝鲜的朋党政治追根溯就要从"中宗反正"<sup>8</sup>中宗即位后为了打压功臣派,而铲除政敌的方法就是培养士林派。就这样,新进士林儒生便趁此机会走上了历史舞台。但由于士林派的实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功臣派与士林派的矛盾也是日益激化,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之后功臣派发动的

 $<sup>^8</sup>$  中宗反正:发生在公元 1506 年 9 月 18 日。这次政变使得燕山君被废,晋城大君李怿被拥立为王,是为朝鲜中宗。

"己卯士祸"<sup>§</sup>事件严重打击了士林派势力。宣告了朝鲜国王失权时代的开始。这样,君主权力被打压而逐步的缩小,加上朋党权力的不断扩大,朋党政治的序幕就因此逐渐拉开。朝鲜王朝的党争是因为士林派的不同的朱子学者在理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与政治斗争相结合而产生朋党竞争,各党派轮番登场,不断竞争甚至打压,因而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党争虽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但是通过党争使朝鲜朝的政治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同时兼有积极的成熟过程和负面的自己崩溃的意思。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所操治国之术的不同,无一例外地演化为意气之争,以致于互相攻许,党同伐异,最终导致党祸,然而政治逐渐趋于成熟和发展。

# 四. 士林对朝鲜朝的影响

士林政治是以性理学为基础,以士林为政治单位的政治集团和行为,士林政治是朝鲜朝政治形式的独特产物。在朝鲜朝"士林政治"中重要人物很多,然而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应该是朝鲜朝初期的郑梦周、金宗直为首的岭南士林派,以及同样是属于金宗直"党派",但是属于"湖南士林"的赵光祖。岭南士林和湖南士林,在朝鲜朝士林政治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岭南士林的成型比较早,士林人数也比较多,相对在政治上影响力更持久。而湖南士林的深受岭南势力的影响,虽然在朝鲜朝政治上的影响岭南士林持久,然而在"道学"方面的作用大于"岭南士林",而且在乡野士林的影响可能比岭南士林更大一些。"岭南士林"和"湖南士林"是韩国士林中的两大陈营,曾左右了朝鲜朝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由此而导致了朝鲜朝思想史上的派系分争。

朝鲜朝士林的形成是从"岭南士林"开始的,岭南士林在朝鲜朝士林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首次介绍性理学的安响是兴州(荣州丰基)人,反对王朝交替的郑梦周是永川人,李

-

<sup>&</sup>lt;sup>9</sup> 己卯士祸: 功臣派新的党首洪景舟、南衮、沈贞等人发动了 1519 年的"己卯士祸", 捕杀了赵光祖等士林派首脑人物, 严重打击了士林派的势力。

谷(1298-1351)和李穑父子之"脉"是在宁海,吉再(1353-1419)善山出身,李齐贤(1287-1367)与庆州有脉。这些人都是活跃在高丽末政界上,并积极接受和普及性理学的过程中起主导的人物。这些人都散居在岭南各地,成为形成岭南士林的重要基础。

金宗直通过学问和人脉,培育了以他为中心的"共同体意识"。以此为前提,他 积极推荐"同类"出仕于中央政界,从而巩固和加强了"组织力"。他们从"林下儒 贤"非正式组织状态下,逐渐发展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吾党"共同体,再发展为"庆 尚先辈党",达到能够得到勋旧派势力的相对认可地位。金宗直身为这个组织的中心, 形成了包括当时朝鲜半岛的很多地方同类"网络",并构成了"士林派"政治势力。 金宗直身为岭南士林的宗长,在朝庭做官的新进士类们中传播崇尚吉再的学风。金宗 直的代表弟子有金驲孙、郑汝昌和金宏弼等人。金宗直的学缘与继承来看,相对于纯 理论哲学的"性理学"相比,更重视"纲常论"式的"义理精神",即强调实践性的 道学倾向。在他的门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成宗时"出身"的新兴士族阶层,而且大部分 是庆尚道人,后人称之为"庆尚先辈党"。他利用成宗的特殊关系,把自己的门人安 排在朝鲜朝初期政治舞台上,并与勋旧派"反目"和"对立"。他在从政时期,为了 实践孔子与孟子思想的"道学政治",要求进行激进的改革。他的弟子"集团"的主 流是新进士流,这些人主导人政治改革。其实,包括金宗直和他的门人对性理学的理 解是仅仅停留在性理学的伦理实践水平,但是,他的门人金宏弼和郑汝昌对于学习性 理学的态度上比其老师有一定的进步,但是在学问的深度和水平来看,并没有多大的 差别。与此同时,在他的门人中,超越朝鲜朝性理学伦理实践水准,把理气心性论为 中心接受和发展,并留有著作的代表人物是李彦迪、李滉、成浑和李珥,后来发展到 了曹植和徐敬德时代。过了一个世代以后,到了金宏弼的门人赵光祖与金安国世代, 对于现实问题比较认真对待。在金宗直士林门派中也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一部分士人 追求经学为主的"为己之学",而另一部分士林是追求词章学,并倾向于"治人"的 性格。比如,他的门人金驲孙在政治和文学上所持的观点和主张是基本相同的。反对 勋旧势力的专横,主张实践儒学的王道政治。而"东方五贤"之一的郑汝昌,则非常 重视《中庸》和《大学》,并具有一贯的体系。他从根本上继承了金宗旨所倡导的儒 学实践精神,热衷于性理学的道学,把它哲学体系化,提出了理论根据。郑汝昌的政 治思想是王道政治,即贤人政治或道学政治。他的王道政治以后,其后连接为赵光祖

的革新政治,乃至于自治主义政治思想。郑汝昌把宋代性理学的学问基础,从士林政治观的角度出发把政治思想系统地理论化,主张儒教的德治主义。德治主义是指有德之人,以道德来感化和指导没有对道德觉醒的人,以此为政治的要谛。德治主义要求治者要成为圣贤,其规范就是"礼",从而主张贤人政治,乃至于礼治主义。

以岭南地区为中心的士林派是以高丽末期郑梦周的"义理精神"开始,金宗直及 其在他的弟子们的努力下,形成了岭南士林学派。赵光祖也算是金宗直的门人,他是 金宗直得意门生金宏弼的学生。然而由于赵光祖是湖南人,而且在湖南遇见了被贬于 此的金宏弼,因此学界把金宏弼和赵光祖"认定"为湖南士林。在他的带领下,湖南 地区大量出现过士林人物,然而由于没有"成名"的人物,而且金宏弼和赵光祖过于 早些过世,因此,实际上没有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湖南士林学派。

但是, 金宏弼的"道学思想", 赵光祖的"道学思想"、"自治主义"思想, 对 韩国朝鲜朝历史的作用是巨大的。朝鲜前期湖南地方士类学脉来看大体上分为五个 "集团",金宏弼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学脉是在全罗道流配五年生活中建立起来的, 比较有名的学者有崔忠成、李勣、尹信、崔山斗、柳桂隣、孟权、张自钢等。其中, 崔山斗给金麟厚教过学问(金麟厚十岁时曾在金安国门下学习,但二者有无实质性的 师徒关系有所勉强)。又通过金麟厚传授到郑澈、奇孝谏、卞成温、梁子徵等。金宏 弼从 21岁(1574)开始金宗直门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金宗直对他影响最大的 《小学》一书。《小学》成为他一生律身的教科书,因此他学习到三十多岁以后,才 开始"放松"了对小学的学习,因此人们称他为"小学童子"。从新罗到高丽,虽然 培养了一些"文章之士",然而真正的"义理之学"是从金宏弼开始。也就是说,十 六世纪朝鲜朝士林精神的源流是金宏弼的道学思想,他的道学思想特别重视"义理精 神"和"实践躬行性"。"士祸期"湖南士林是以这样的道学思想为基础,积极参与 现实政治,强调经世意志。这样的理念和行为受到反对势力的强烈反对和迫害。金宏 弼虽然把"修己"做为自己的理念,但是为了实践性理学理念和理想,不可能完全拒 绝出仕,因此虽然晚了一些但毕竟转向了"治人"。所以,他的"治人"思想是儒教 理想的"王道政治"、"道学政治"和"尧舜三代之治"的"至治"思想为基础和前 提。金宏弼虽然没有活很长,接触师友门人机会也不可能很多,但是他结交了相当数 量的师友和门人(52人)。在这些人当中具有明显的士林派性格的人,其中赵光祖和 金安国为代表。赵光祖不仅继承了金宏弼的学统成为朝鲜性理学"正统"的第一人,而且主导中宗朝时期政治改革进的重要人物。金宏弼业绩和人生是通过赵光祖的定性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金宏弼虽然在韩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在人生的历程中没有能够"圆满",然而他把学统传授给赵光祖是韩国历史中的历史性事件,使得师徒二人能够进入"文庙",这是韩国历史发展中最初的"荣誉"。

在韩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大体上把金宏弼看成是提倡道学,继承先圣开辟后 学之人物: 而把赵光祖功过看成是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道学, 并想用来拯救这个世 界和使人善良。朝鲜朝虽然是儒教立国的时代,但是在思想特征中以赵光祖为标准, 之前和之后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赵光祖之前的儒学具有强烈的伦理政治的意义,很难 说成是深入到道学的思想。赵光祖是朝鲜李朝前半期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前期士林 的代表人物。由于他的祖辈几乎都是有学问很高的的高级官僚,生长在这种家庭,赵 光祖从小就受儒学教育。赵光祖在任职期间,李氏王朝由于面临尖锐的社会矛盾,朝 廷内部也分成士林和勋旧两派,其矛盾愈益激化。以赵光祖为首的士林派,用朱子学 为理论武器,把勋旧派贬斥为"小人辈",揭露其丑恶嘴脸。同时对王朝之弊也采取 批判态度,主张实现王道政治。他所信仰的朱子学并不是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也不 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这是不可置疑的。但是,他的这种实践和献身精神都是很可贵 的。赵光祖主张朱子学来统一一切学术,反对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宗教迷信说教。他 在任职期间,采取严禁新建寺院,把旧寺院归属于乡校,将许多僧侣还俗编入军籍等 许多实际措施。赵光祖为了肃清道教的思想影响,曾多次奏请国王废除道教神堂一昭 格署。他还不遗余力地抵制了盛行于地方的各类迷信活动。赵光祖的"兴起斯文" "崇道学",排斥异端的实践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推动了哲学思维的进 一步发展,并为朱子学的盛行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假如没有以赵光祖为首的前期 士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那么李晃、栗谷等朝鲜大儒闻名东方诸国的理论成功, 便无从谈起。

# 조선조 "士大夫"의 정치참여형태와 영향

## 방호범

중국 혹은 한반도와 관계없이 통치계급의 필요에 따라가서 "선비(土)"는 지식인으로부터 "사림 (土林) "은 지식인 계층에서 "사대부 (士大夫)" 관료 계층으로 상승하였다. 이처럼 유학자를 중심으로 한 사대부는 중국을 중심으로 하는 동아시아 정치문화에 영향을 미쳤다. 유학이 조선에 준 여러 영향 가운데 처음부터 "사림"과 "사대부"를 떠나서 말할 수 없으며, 이들을 떠나서 조선 의 유학사상과 유가사상이 조선왕조에 끼친 영향을 완전하게 이해할 방법이 없 다. 왜냐하면 여말선초(麗末鮮初) "역성혁명(易姓革命)"의 과정에서 "사림" 의 인사들과 "사림파(士林派)"는 매우 중요한 역할을 했기 때문이다. 고려 말 부터 시작한 "사대부(士大夫)" 들이 수용한 주요 사상은 송대(宋代)사상이다. 송대의 사대부들은 일종의 도덕이상주의의 정신을 구축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실천 적 측면에서 사회의 윤리질서를 새롭게 만들기를 갈망했다. 그들은 "천하의 일을 자신의 소임으로 삼는다(以天下为己任)"를 유가(儒家)가 "인(仁)을 자신의 소 임으로 삼는다."는 사상을 계승하고 발전시켰으며, 또한 사대부들은 정치를 혁 신하고, 풍조를 돈독하고 화목하게 하고, 학문을 진작하고, 아울러 정치·사회생 활에서 공훈을 세우고, 창업과 계승을 하나의 도덕정의와 생명의 사명으로 여기 며, 송대의 도덕생활사의 새로운 장을 열었다. 송대의 이러한 사대부사상은 고려 말부터 등장한 사대부의 사상에 영향을 끼쳤을 뿐만 아니라, 조선의 역사문화의 발전과정에도 직접 영향을 미쳤다. 물론 사대부들이 정치에 참여하는 과정에서 많는 경우 통치자를 맹목적으로 따르지 않고, 자신이 가진 독특한 "사대부정신 (士大夫精神)"을 굳게 지켰다. 조선시대 사대부는 당시 사회의 정치 경제 문화 생활 등 여러 영역에서 중국보다도 훨씬 초과했다.